

宗教身份与罗马人格法^{*}

汪 琴

宗教身份是指某宗教团体（派别）及其信徒在世俗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基督教传入罗马前，各宗教间保持着和平共处的态势。其时，拥有某宗教身份不会影响人们的法律地位。但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这种情况改变了。帝政初期，他教信仰者因憎恶基督徒而对其迫害。因基督教身份，基督徒或被剥夺市民身份降为外邦人；或被剥夺自由身份降为奴隶。此时，宗教身份是人格变更的因素。而当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时，信仰正统的基督教则成为完整人格的构成要素。凡信仰正统基督教则享有完整的权利能力；反之则具体权利能力受限，但不会导致身份的剥夺。

关键词：基督教 宗教身份 罗马法 人格

作者：汪琴，1976年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宗教身份是指某宗教团体（派别）及其信徒在世俗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罗马法中，身份实际上是人格的构成要素。所谓人格是指国家赋予自然人或某一组织享有的法律主体资格。早期罗马法中，自然人只有同时具备自由、市民、名誉（infamia）和家族4种身份才能享有法律主体资格。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后，则须同时具备自由、市民、名誉、家族与宗教5种身份才可享有法律主体资格。而缺失任何一种身份都会导致法律主体资格的丧失和权利能力的受限乃至剥夺。罗马法上称这一现象为人格变更（capitis deminuto）^①。也即是法律地位的改变。

从整个罗马法发展史来看，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一度被人格法边缘化的宗教身份与人格法之

* 本文为浙江农林大学科校发展基金人才启动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编号2011FR004；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资助编号为20110490690。本文得益于我的导师徐国栋教授关于宗教身份的研究。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3页）。关于本文使用的缩略语的说明：D.是指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C.是指优士丁尼的《法典》；I.是指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C.Th.是指《狄奥多西法典》；Nov.是指优士丁尼的《新律》。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4。

① 在罗马法中，人格变更有3种：最大变更（capitis deminuto magna）、中变更（capitis deminuto media）、最小变更（capitis deminuto minima）。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前，完整的人格是由自由身份、市民身份、家族身份和名誉身份构成的。任一种身份的丧失均导致人格变更。换言之，当丧失自由权降为奴隶时，后3种随之丧失，这是最大人格变更。若丧失市民身份但保留自由身份，则为人格中变更。当保留自由身份和市民身份，只是家族身份或名誉身份发生变化，则为最小人格变更。被判极刑、被判处斗兽和被判处矿山服劳役，都将导致自由身份和市民身份的丧失，是人格最大变更；被判处永久放逐则导致市民身份的丧失，是人格中变更；被宣告不名誉则为人格最小变更。（参见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1-43）。

间的关系,发生了从作为人格变更原因演化为作为完整人格之构成要素的变迁,权利能力的剥夺方式也随之从以剥夺身份为媒介的间接方式演变为直接剥夺权利能力的方式。目前,国内外有些学者就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后宗教身份与人格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曾作过深浅不一的研究,但聚众纷纭,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种:

(1) 人格要素说。该学说认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宗教身份并未影响人格或法律能力,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宗教身份才影响人格。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文切佐·阿朗鸠·路易斯(Vincenzo Arangio-Ruiz)、M. A. 谢尔顿·阿莫斯(M. A. Sheldon Amos)、彼德罗·彭梵得(Pietro Bonfante)、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 Grosso)和我国罗马法学家徐国栋教授。在学者文切佐·阿朗鸠·路易斯看来,“在远古罗马法中宗教身份并不构成获得法律主体资格之阻碍的原因。在帝政初期,除了禁止虚幻的迷信和魔术外,罗马官方还在更大范围内对基督教进行迫害。然而,这种迫害很显然不是基于单纯的宗教目的,而是基于基督教教义与帝国传统宗教间不可避免的斗争。正如在这次斗争中所表明的一个事实,即基督教反对帝国时期的献祭刑以及证实皇帝威严的规定。因此,此时反对新宗教的残酷的斗争并没有反射到法律能力上。但当基督教取得胜利后,对因宗教身份而产生的对法律主体资格的限制则隐含在313年的君士坦丁皇帝的敕令中。”^①学者M. A. 谢尔顿·阿莫斯同样认为,“从君士坦丁时期到优士丁尼时期,宗教信仰的正统性逐渐成为取得人格的条件。到优士丁尼时代,罗马帝国的国民被分为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分为天主教徒和异端教徒。天主教的信仰是正统的基督教,天主教徒享有所有民事权利,至少在宗教基础上,不会承受任何能力的丧失。对于其他的否定、背叛或者参加非法的宗教仪式的人则要承受能力的剥夺。”^②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通过追溯历史,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虽然基督教的出现打破了各宗教和平共处的局面,但是直到它成为帝国国教之前,人们从没颁布过限制基督徒权利能力的规定。当基督教国教地位确立后,宗教的不容忍现象才开始高涨,出现了一系列限制乃至剥夺非基督徒和异教徒、犹太人权利能力的规定。”^③意大利罗马史学者朱塞佩·格罗索在研究罗马法史的过程中亦发现这一事实,并作出了与上述学者相同的评论^④。我国罗马法学者徐国栋教授在其《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中也曾谈到这一问题。他讲到“在罗马法中,宗教身份是一种晚近的身份,存在于狄奥多西一世确认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其时,信仰正统的基督教日益成为完整人格的一个要件。”^⑤

(2) 前期为人格变更的原因,后期为人格要素说。该学说认为,基督教迫害时期,宗教身份使主体人格发生了变更。而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时,宗教身份则只影响了主体的具体权利能力。进言之,若具有基督教身份则拥有完整法律人格,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反之,则不具备完整法律人格,权利能力要受到一定限制。持这一学说的学者主要有阿都拉多·沃勒德拉(Edoardo Volterra)、J. E. A. 克拉科(J. E. A. Crake)和俄勒文·J. 邬勒克(Erwin J. Urch)。学者阿都拉多·沃勒德拉认为,“罗马共和时期和帝政初期对基督徒的迫害仅仅导致自身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的变更。而到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后,从事确定宗教活动或者隶属于确定的宗教

① Vincenzo Arangio-Ruiz, *Istituzioni Diritto Romano* (M). Dodicesima Edizione Ristampa. Casa Editrice Dott. Eugenio Jovene, 1956: 61-62.

② M. A. Sheldon Amos,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of Rome - An Aid to the Study of Scientific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M]. Kegan Paul, Trench & Co., London, 1883: 113.

③ 彼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书(修订版) [M]. 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37.

④ 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⑤ 徐国栋. 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3.

团体才构成人格丧失的原因。”^①学者 J. E. A. 克拉科和俄勒文·J. 邬勒克也是如此认为^②。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十分详尽地记述了基督教迫害史和异教徒之迫害经历, 鲜明地展示了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前后宗教身份与人格制度的关系^③。我国历史学者谭建华教授在其《〈民法大全〉与基督教影响的扩大》一文中,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中对基督教的扶持规定与对异教徒和异端教徒的惩罚规定^④。从他细致地介绍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在罗马法中, 宗教身份对一个自然人之人格的影响, 也就是对主体资格及其享有的利益的范围的影响。

对于上述两种学说, 我比较赞同第二种学说。即当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前, 宗教身份是人格变更的原因; 而当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确立后, 宗教身份便成为了完整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为了佐证这一观点的虚实, 我将从罗马法原始文献入手, 对宗教身份与罗马人格法间关系的演变作一历史考察与分析。

一、作为人格变更原因的宗教身份

在远古时期, 尽管罗马人独尊自己城邦的神, 但同时他们也不排斥其他城邦的宗教, 对于这些他教信仰, 罗马人均以宽容待之。因此, 这一时期, 罗马人不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生人格变更或权利能力受限。帝政初期, 基督教传到了罗马, 由于它奉行一神论, 基督教信徒在强烈抨击罗马传统宗教信仰的同时还坚决抵制皇帝崇拜, 毋庸置疑, 这势必加剧罗马传统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摩擦, 最终引发罗马他教信仰者与基督徒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身份从此成为基督徒承受永久放逐并剥夺部分财产^⑤、判处斗兽^⑥、判处矿山服劳役 (damnatio ad metallum) 和极刑^⑦等刑罚的理由。在罗马法上, 被判极刑、被判处斗兽和被判处矿山服劳役, 都将导致自由身份和市民身份的丧失, 是人格的最大变更; 被判处永久放逐则导致市民身份的丧失, 是人格中变更。由此可见, 其时, 基督教身份已成为了一种人格变更因素。举凡基督教身份的承载者都要因基督教身份承受人格变更的惩罚。

(一) 远古和前古典时期居于人格法边缘的宗教身份

古罗马盛行多神教, 它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神论基础上的集原始哲学、原始神话、原始法规及原始伦理道德于一体的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仪式简单而要求严格, 无论家族祭祀或城邦祭祀都是秘密进行, 禁止家族以外的人或异邦人参加。因为罗马人深信, 罗马神是和他们一起居住在罗马城内的, 是专属于罗马人的。他们守护着罗马城, 帮助罗马人抵御敌人的侵犯。为了向这些神灵表示他们的虔诚, 使得这些神灵对他们不离不弃, 罗马人只信奉和祭祀本城邦的神, 而不信仰其他城邦的神。更为甚者, 罗马人还禁止外邦人祭祀罗马神。从这一层面上讲, 这一时期可以视为罗马原始宗教的独尊时期。自罗马共和时期, 随着罗马疆土的不断拓宽, 商业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战争和商业交易的带动下, 一些被征服地区的文化陆续地传入罗马, 尤其是希腊神话和神

① Edoardo Volterra, Istituzioni di Diritto Privato Romano [M]. Romano: La Sapienza Libreria Universtitaria. 1980: 682.

② J. E. A. Crake. Early Christians and Roman Law [J]. Phoenix, 1965, 19 (1): 61-70; Erwin J. Urech, Early Roman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J]. The Classical Journal, 1932, 27 (4): 255-262.

③ (英)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上) [M]. 黄宜思, 黄雨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06.

④ 谭建华 《民法大全》与基督教影响的扩大 [J], 历史教学, 2003 (09)。

⑤ (意) 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 民法大全选译·人法 [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74.

⑥⑦ 同上, P. 52。

学思想以及东方宗教。这些外来文化与罗马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原始宗教的独尊地位。文化传统的多元化消解了统治者对宗教信仰的限制,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已经从固步自封走向了自由开放。对此,法国学者伏尔泰(Voltaire)评述道,罗马人效仿希腊人并接受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抑或允许其存在,这是因为宽容一切宗教是铭刻于每个罗马人心中的自然法。尽管罗马法禁止任何人在未经官方同意的条件下祭祀异族的神和新神,但在实践中,罗马人对其他宗教信仰持一律宽容的态度。这种对世上一切神祇的一视同仁、兼收并蓄,是所有古人严守的原则^①。

由上可见,无论在罗马原始宗教信仰独尊时期,还是在信仰多元化时期,人们并没有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相互倾轧,而是以宽容待之。而这种宽容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在这种宽容的古精神的主导下,宗教信仰自然就不会成为划分正负两种极端身份的依据,更不会影响社会资源在不同宗教身份承载者间的合理配置。换言之,在宽容理念的引导下,不同宗教团体间都能相互容忍,和谐共处,友好以待。宗教身份的这种泛化使得身份自身具有的对偶性无法得以凸显,同时也使其具有的分配功能无法得以施展。因此,在这种宽容的社会氛围下,宗教身份不可能阻碍法律人格的取得。

(二) 基督教迫害时期演化为人格变更原因的宗教身份

事实上,各民族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是基于各民族对各自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容忍,以及宗教信仰与政治活动的脱离。而容忍的政策是要靠彼此的宽容才能得以维持,倘若谁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宽容义务,那么,容忍的政策自然就会不复存在^②。由此可推想,如果某个教派把自己从这个共存共荣的团体中分裂出去,声称唯有他们了解神意,而且还将除自己教派之外其他一切宗教信仰都斥之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那么,它必然会触怒其他所有教派,使它们联合起来,群起攻之。事实上,早期基督教就面临着如此境况。

对基督徒而言,他们相信基督是惟一的救赎之神。因为,他们时刻铭记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③后来,对耶稣基督的这番话语,使徒彼得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④基督徒的信仰并非形式上的信仰,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地依照基督的话语生活的信仰,即“你们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⑤而且,他们坚定不移地遵守上帝的命令“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⑥正是基于上述信仰,早期基督徒坚决抵制并痛斥罗马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献祭仪式和对皇帝的崇拜。他们的这种态度使罗马人误将基督徒理解为“无神论者”。同时,基督教与他教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基督教对他教的不宽容和基督教教父对他教陋习的激烈抨击,终于酿成了一场残酷的宗教冲突。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由此拉开了帷幕。

最早对基督徒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是罗马帝国皇帝尼禄(Claudius Nero, 54-68年)^⑦。基于

① (法国)伏尔泰. 风俗论 [M]. 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14.

② (英)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M]. 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06.

③ 《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版。本文所引《圣经》内容均出自此书。

④ 《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

⑤ 《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

⑥ 《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

⑦ 尼禄的政策是否针对的是基督教,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这一信息是捏造的或受到了夸大。基督教遭受迫害应是起于3世纪即戴克里先皇帝执政时期。(参见J. Beaujeule. L'Incendie de Rome en 64 et Les Hérétiques, [M]. Brussels 1960: 31-38)。

对基督徒执拗的信仰态度和道德观的憎恶，尼禄皇帝拒绝赋予基督教以合法宗教地位，他不仅判罚一些基督徒与猛兽决斗，而且还大肆屠杀基督徒^①。对此，有学者认为，尼禄掀起的这一场宗教迫害实际是针对犹太教的，因为早期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②。其实，在尼禄统治时期，基督徒已经从犹太人分离出来了，而且他们还被犹太人视为一个不可容忍的、非法的宗教团体。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既不严守摩西律法，又不接受割礼，俨然亵渎了犹太人的神。最令犹太人惶恐不安的是，许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大大扩大了基督教队伍。于是，当面对尼禄残酷迫害时，他们毅然与基督教决裂，否定基督教是犹太教（Judaism）的一个分支，他们不仅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还在罗马官员面前煽风点火，诱使他们去迫害基督徒。针对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裂，有些史学家认为，罗马人从尼禄皇帝时期起已将犹太人与基督徒区分开来，因为基督徒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都会在每周日的黎明前聚会举行敬拜仪式^③。犹太人则不同，尽管他们与基督徒一样都相信灵魂不灭，但在他们的教义中并不存在“复活”的观念，而且他们的祭祀活动通常都是独自进行的。据此可推测，尼禄的迫害举措可能是因基督教而起。为了使自己迫害基督徒的恶行得以合法化，尼禄皇帝遂将基督徒身份作为迫害基督教的理由。他认为基督徒身份是从事颠覆性的以及难以形容的令人憎恶的活动的表征。由此看来，基督徒之所以被定罪实乃因基督教信仰。尼禄的这一做法竟然得到了后世几位皇帝的效仿。

从公元1世纪到2世纪，罗马法中尚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地反对基督教的敕令或元老院决议^④。在这一时期，举凡基督徒的案件一般都是由行省总督来负责处理^⑤，而且无需经过刑事证明程序，直接依据特别批复就可以对基督徒进行判决^⑥。对此，公元4世纪的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265—339年）曾讲到“在罗马，许多出生高贵、才能卓越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无数有名望的人则被无厘头地驱逐出罗马城，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⑦112年，比提尼亚行省总督小普林尼（the Younger Pliny，61—113年）^⑧就如何审理基督徒案件写信向图拉真皇帝咨询。图拉真（Ulpius. Nerva. Traianus，98—117年）皇帝回复小普林尼说，由于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法律；不必深究基督徒所犯的罪名；如果证实某人是基督徒则应对他科以惩处；匿名控告者不予受理。乍看上去，图拉真皇帝似乎在为基督徒开脱罪行，但若仔细斟酌“如果证实某人是基督徒则应对他科以惩处”这句话所蕴藏的意义，我们便可以发现图拉真皇帝实际是沿用了尼禄皇帝的做法——以基督徒身份作为定罪的依据，换言之，只要被证实是基督徒就可以对他施以惩罚，根本无需深究其行为触犯何种法律以及应定何种罪名。同时这一批复也告诉我们小普林尼所生活的时代尚没有制定出如何惩罚基督徒的法律。不过，这似乎并没有阻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反而愈演愈烈。继尼禄皇帝之后，自誉为“主和神”图密善皇帝（Domitianus，81—96年）再次掀起了对基督教的迫害。在他执政期间，他以“无神论和行同犹太人”为

① 〔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下）〔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41。

② J. E. A. Crake. Early Christians and Roman Law [J]. Phoenix, 1965, 19 (1): 61—70.

③ E. H. Warmington. Remains of Old Lat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493.

④ 〔英〕巴洛 R. H.：《罗马人》〔M〕，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0; J. Moreau. La Persecution du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56: 66—70.

⑤ A. N. Sherwin—White. Roman Society and Roma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1963. 1—23; A. H. Jones. Studies in Roman Law and Government [M]. Oxford, 1960: 53—56.

⑥ D. 48, 19, 13, (参见 Justinia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M]. Vol, IV,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tso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⑦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M]. trans. G. A. Williamson, trans. G. A. William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5: 125.

⑧ 小普林尼 (Pliny, 61—113年)：《罗马作家》，行省总督。

罪名杀害了改信基督教的弗拉维·克雷芒，并放逐他的妻子多密西拉于一个荒岛^①。同时，他还将使徒约翰放逐于帕特摩斯岛^②。安东尼努斯·庇尤斯皇帝执政时，士每那大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69-115年）^③因拒绝以皇帝的名义宣誓和诅咒基督而被处以火刑。其后，马可·奥勒流皇帝执政期间，希腊护教士查士丁^④和主教波提诺（Pothinus）先后被杀。上述两位皇帝其实是效仿了尼禄皇帝的做法，以基督徒的身份作为定罪的理由，即凡被称为基督徒的，都要承受惩罚。

自3世纪以后，基督教会的数量、势力和威信逐步强大起来，这使得那些致力于帝国统一宏图的皇帝无形地感到一种威胁。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言，一旦宗教发展成与政治团体具有平等地位的事物时，紧张随之而来，但是一个宗教愈是“教团性”^⑤的，政治环境就愈有助于被支配者伦理的宗教性转型^⑥。由于基督教顽强地忠实于早期的不宽容立场，拒绝承认他教，对其信徒的要求近乎绝对，由此使得基督教与罗马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紧张，以至于他教信仰的罗马皇帝颁布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不过，这一时期的迫害不再像最初的两个世纪以基督徒身份为由而是以国家的福祉和统一的需要的名义实施的。250年，德求斯皇帝（Decius，249-251年）颁布敕令，规定，基督徒必须向罗马诸神和皇帝献祭^⑦。凡拒绝者须承受拷打、流放和处以死刑。257年，瓦勒里安皇帝（Valerianus，253-260年）颁布敕令，禁止基督徒做礼拜。258年，他接着又颁布敕令，下令处死那些拒绝向罗马神和皇帝献祭的主教、教士和执事，或将他们流放。他企图将基督徒从罗马高贵阶级中彻底清除掉。为此，他没收了信仰基督教的元老和骑士的财产，并强调，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信他教，将被处以死刑^⑧。303-305年期间，戴克里先皇帝（Ulpianus Nerva Traianus，98-117年）为了巩固帝国，严厉打击可能导致分裂的种种势力。由于基督教强大的组织使他感到巨大压力，因此他不仅将基督徒视为罗马帝国的敌人，而且认为他们是革命的教派。为了彻底消灭基督教的势力，他联合加勒流斯皇帝对基督教进行了大肆的迫害，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他不仅捣毁基督教教堂、烧毁经书，没收教会财产^⑨，而且还让生来自由人的基督徒承受不名誉惩罚，禁止他们享有市民资格、担任罗马公职和享有任何荣誉；信奉基督教的奴隶终身不得获得解放；基督徒不得因自身受到任何伤害而向法官提出诉讼；所有基督徒必须向罗马诸神献祭，否则要承受死刑^⑩。

①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 [M]．张竹明，王乃新，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8。

② 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32．〔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24。

③ 波利卡普（Polycarp，69-115年）：出生于小亚细亚，传说为使徒约翰的弟子，故被称为后期教父。因拒绝判教，被焚身而死。

④ 查士丁（Justin，30-100年）：出生于巴勒斯坦撒玛利亚地区。他是最早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结合起来的护教士。

⑤ 所谓教团性是指由祭司阶层控制的且屈从于政治团体的宗教。（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 [M]．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9）。

⑥ 〔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 [M]．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9。

⑦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M]．ed. Henry Bettenson，ed. Henry Bette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19。

⑧ George C. Brauer，The Age of the Soldier Emperor: Imperial Rome，A. D. 244-284 [M]．Park Ridge，Ill.: Noyes Press，1975：113。

⑨ A. E. R. Boak，History of Rome to 565 A. D. [M]．New York: Macmillan，1947：427。

⑩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8；〔英〕巴洛 R. H.．罗马人 [M]．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3。

从上述史实可发现,法与历史之间的纠葛实质是关于罗马皇帝为了使其对基督教迫害合法化而寻求立法理由的问题。至少在前几个世纪,信仰基督教自身就为犯罪,凡承认信仰基督教并承认基督徒身份者,要么以违反了公共安全罪被控告,要么因拒绝参加他教的公共祭祀活动和拒绝对皇帝的崇拜而被处以献祭刑、永久流放和矿山服劳役的刑罚。但到了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迫害的矛头好像直接指向基督徒个人。他颁布的一系列法令鲜明地展现出他对基督徒的无比憎恶;他宣布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敌人,基督教的教义毁坏了罗马和平;他剥夺了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市民的市民身份,并将他们永久放逐。由此看来,基督教身份给其承载者带来了不利益,显然是一种负身份;相反,他教信仰者身份则使其承载者保有或取得利益,当然是一种正身份。宗教身份利益含量的两级分化彰显了宗教身份的分配功能,宗教身份由此构成了人格之享有的障碍,引致人格变更。

二、作为完整人格构成要素的宗教身份

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宗教地位,使得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命运峰回路转。380年,狄奥多西皇帝确立基督教为帝国国教。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影响和政治统一的需要,帝国的他教信仰者成为了被排挤的对象,他们的权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督徒皇帝的限制乃至剥夺。相反,基督徒则因正统基督徒身份而取得完整人格,享有法律赋予的所有权益。进言之,基督教身份已从人格变更的原因演化为取得完整人格的必备要素。

对基督徒而言,基督信仰就是按照基督和《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是无私地、充满感激和爱慕地接受上帝的旨意、圣言和作为。信仰所行的是真理和爱的道路,因此,不信(Infidelity)、分离教会(Schism)、异端(Heresy)和背教(Apostasy)都是对信仰之真理的怠慢和漠视,是最直接冒犯基督教信仰的罪。一般而言,不信是指一个没有接受过洗礼的人忽视去探寻真正的信仰,或者故意抗拒基督教真理。分离教会是指固执地拒绝服从于教宗的首席地位,但并不否认教会的教义。异端是指固执地坚持一个错误观念,而这种错误观念反对神圣启示的真理。它意味着对天主所启示之真理怀有选择性的意图^①。“它实质是任意且专断地选择教义”。^②背教是指完全地背弃受洗时所接受的真正的信仰。在这4种罪中,异端与背教是最为严重的两种罪。早期基督教教会严厉斥责这些不信行为,并将分离教会者、异端教徒和背教者驱逐出教会,禁止他们与其以前的教友交往。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则认为,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异端分子应采用武力。他说,看起来似乎严酷的措施,或许能使反抗者认识其中的正义。难道主自己没有说过,“勉强人进来吗?”^③正是基于圣奥古斯丁的这种观点,后世残忍的宗教裁判才得以合法化。可能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基督徒皇帝对异端的惩罚日益加重。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教会对上述4种非正统基督徒的憎恶从宗教层面演化为政治层面,鲜明地体现为罗马基督徒皇帝对非正统基督徒的迫害。诚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所说的,一种受压制的宗教,一定会变成压抑他人的宗教。这是一条规律。因为一种宗教一旦偶然摆脱了压制,它马上就会攻击曾经压制过它的宗教——不是作为宗教来攻击,而是作为暴政来攻击^④。

① (德)卡尔·白舍客. 基督宗教伦理观(第1卷) [M]. 静也, 常宏译, 雷立柏, 校.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80.

② Haring, Bernard.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J]. St Paul Publications, Slough, 1979, 24 (2): 68-79.

③ 《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 布鲁斯·雪莱. 基督教会史(第2版) [M]. 刘平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41;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as [M]. trans. George E. Mocrack-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99.

④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 [M]. 孙立坚, 孙丕强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47.

380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敕令确立基督教为帝国国教,由此揭开了彻底清除他教的帷幕。他在敕令中写道“我们希望全体国民本着仁慈和温和继续信奉由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宗教信仰,这是我们的旨意。我们要相信独一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是神圣的三位一体。我们赋予遵循这个准则的人以大公基督徒之名。但是,但对那些否定或忽视这一信仰者,将被归于异端,他们的会堂不能冠于教会之名,他们将首先承受上帝审判的责罚,然后承受我们根据上帝的审判实施的处罚”。^①

从上述敕令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1)基督教一旦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帝国居民之间便产生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分。在基督教一神论信仰的冲击下和基督徒对他教信仰者^②的不宽容态度的影响下,原初的各宗教间和平共存的良好势态被打破,传统宗教从此失去了合法宗教地位,成为被取缔的非法宗教,其教徒也因之遭到帝国法律的各种惩罚。诚如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言,他教在狄奥多西时代的毁灭可以说是在人类思想史中仅有的一个古老的、流行的迷信归于彻底灭绝的例证^③。(2)“三位一体”的信经成为了罗马官方信仰。这一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它被誉为大公基督教的标志。凡否认此信仰的基督徒,均为异端教派(Heretics)。所谓异端教派主要是指持“基督一性论”的教派、反对大教会的多纳图教派(Donatista)和贝拉基教派(Pelagianus)等。由此便产生了正统基督徒身份和持异端学说的基督徒身份之分。前者当然是正身份,后者则为负身份,负身份的承载者须承受基督徒皇帝法律的惩罚。此外,为了避免重蹈君士坦斯时代有令不行的覆辙,保障该敕令的实施,以实现基督教信仰的大一统,狄奥多西皇帝及其继任者接受了正统基督徒的意见,颁布了两条貌似真理的宗教性规定:(1)行政官员如对某些罪行不加制止,不予惩罚,他便在一定程度上犯下了同样的罪行。(2)对假想的神灵和真正鬼神的崇拜是对造物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所犯下的最不宽恕的罪行^④。

在其后的近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因拉丁教父圣安布罗斯^⑤和其他基督教教父的影响,狄奥多西皇帝及其后世的基督徒皇帝展开对非正统基督徒的迫害。他们针对他教信仰者(Pagan)、犹太人(Jew)、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摩尼教徒(Manicheanism)、异端教派和背教者(Apostate)制定了大量的限制其权利能力的规定。尤其是在优士丁尼时期,这种迫害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所以,意大利学者彼德罗·彭梵得才如此说道“优士丁尼法出现时,我们在这条悲惨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了”。^⑥同样,法国学者伏尔泰也感叹道,基督教如此行径真令人可悲!在他看来,基督教取得的胜利原本应该使他们产生和平的精神,但某些人却醉心于满足复仇的欲望,使得基督教的圣洁遭受亵渎^⑦。针对优士丁尼皇帝对非正统基督徒的迫害,宗教史学家威利斯顿·沃克(Williston Walker)评论道,“在优士丁尼时期,他教所遭受的压制和迫害前所未有”。^⑧同样,史学家J. B. 博瑞(J. B. Bury)也认为,优士丁尼在迫害他教的道路上比任何皇帝都走得远^⑨。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照样也说道,“所有异端分子被要求必须在短短3个月内要么改变信仰,要么承受流放之刑罚;如果他任凭他们保留他教信仰者

①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M]. ed. Henry Betten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31.

② 此处的“他教信仰者”,不单指信仰除基督教之外的宗教的人,也包括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③④ [英]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M]. 黄宜思, 黄雨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456.

⑤ 安布罗斯认为对犹太教的宽容就是对基督教的迫害,而且召集众基督徒火烧犹太人的会堂。(参见 Grayzel, Solomon. The Jews and Roman Law [J].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New Ser., 1968, 59 (2), 93-117)。

⑥ (意) 彼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书(修订版) [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37.

⑦ (法) 伏尔泰. 风俗论 [M]. 梁守锵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42.

⑧ (美) 威利斯顿·沃克. 基督教会史 [M]. 孙善玲,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77.

⑨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 Macmillan & Co. Ltd., 1923: 364.

身份,那么他们将不但失去社会对个体的一切福利,同时还将被剥夺生为自由人和基督徒的权利”。^①对于罗马基督徒皇帝对他教信仰者所做出的惩罚性规定,现代罗马法学者 M. A. 谢尔顿·阿莫斯认为,对于这些非基督徒权利能力的剥夺,与其说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是属于教会史上的问题。他们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地位如此变幻莫测,实属古代之罕见^②。

事实上,从 427 年到 438 年编纂完成的《狄奥多西法典》、534 年修订的《优士丁尼法典》和 534 年到 565 年编纂完成的《新律》的有关规定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基督徒皇帝对他教信仰者和异端分子的不宽容,这恰恰表明了独尊基督教的氛围下宗教身份决定着完整人格的享有与丧失。从此意义上讲,宗教身份成为了取得完整人格的必要条件。只有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罗马市民才可以取得完整人格,享有与之相应的权利能力,而不会因宗教身份承受任何能力的丧失。相反,对于那些否定正统基督教信仰、背叛基督教或者参加非法宗教仪式的他教信仰者而言,他们要承受权利能力剥夺之惩罚,人格的完整性因他们的宗教身份而发生缺损。依此可见,能力剥夺方式已从剥夺身份来间接剥夺权利能力转变为直接剥夺权利能力。对此,我们可以从基督徒皇帝对非正统基督徒的惩罚规定中分析得出。

1. 基于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和一神论信仰,罗马基督徒皇帝规定,所有他教信仰者要么改信,接受洗礼;要么被永久流放,没收所有财产,全部归国库所有^③。禁止他教信仰者举行任何宗教祭祀活动和集会,如果违反该规定举行或参加他教祭祀活动,他将承受放逐的刑罚,因继承或受赠获得的财产将归国库所有^④。根据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记述,君士坦丁皇帝之后的几代基督徒皇帝在长达 60 年的时间里已将他教庙宇铲除殆尽^⑤。

2. 关于犹太人和他教信仰者的限制性。(1) 禁止担任罗马公职和从军。犹太人和他教信仰者被禁止担任国家公职和承担民事职责或公共职责,而且无资格获得任何尊严,也不得获得行使父权的荣誉。犹太人和他教信仰者参加不得针对正统基督徒和基督教信仰的追随者而开展的审判活动,也不允许在控诉基督徒的案件中作证。同时他们也不享有从军权。但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职位就是市议员(Decurionate)。较之于其他公职,这个职务不仅开支大责任重,而且出任者在执行公职还要自行承担更多的花销。正因如此,罗马人一般都极力避免充任该职务。不管如何,这一时期,他教信仰者和犹太人完全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权利能力。正如史学家 J. V. A. 俄宛斯(J. V. A. Evans)所记述的,优士丁尼时代,他教信仰者被剥夺了担任公共职务如高级官吏、市政官及从军的权利,同时也不能享有元老阶层的特权^⑥。(2) 禁止蓄养买卖基督徒奴隶。即犹太人和他教信仰者不得拥有、购买或使用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如果拥有,上述基督徒奴隶则获得自由,而拥有该奴隶的人应向国库缴付 30 磅的罚款^⑦。对于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的他教信仰者大庄

① [英]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 [M]. 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78。

② Amos M. A. Sheldon.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of Rome – An Aid to the Study of Scientific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M]. Kegan Paul. Trench&Co., London, 1883: 113。

③ C. 1, 2, 10、C. 1, 11, 10,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④ C. Th. 16, 10, 10、C. Th. 16, 10, 12、C. Th. 16, 10, 23、C. 1, 2, 10、C. 1, 11, 9, (参见 Joseph Wheless. Forgery in Christianity [M]. Moscow: Idaho Psychiana, 1930)。

⑤ C. Th. 10, 16 (399 年)、C. Th. 16, 5, 43、C. Th. 16, 10, 19 (407 年), (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M]. 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23)。

⑥ J. A. S. Evans, The Age of Justinian: The Circumstances of Imperial Powers [M], Routledge, 1996: 68。

⑦ C. 1, 3, 54、C. 1, 10, 2,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Nov. 37, (参见 Justinian. The Novels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园主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许多犹太人为此不得不放弃辛苦经营的庄园而从商,有些人则远走他乡。可见,他教信仰者和犹太人被剥夺了对基督徒奴隶的支配权。如此看来,他教信仰者和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已是每况愈下。如同史学家 J. B. 博瑞所言,以前犹太人只要尊重基督徒奴隶的信仰,就可以拥有基督徒奴隶,而现在则不行了^①。(3) 剥夺他教信仰者与基督徒进行交易的能力。任何基督徒通过购买、抵押的方式将其不动产如土地转让给他教信仰者,该转让行为无效,该土地买卖合同也无效,并且此种交易的财产将收归国库所有。同时,他教信仰者也不能通过出租、买卖、质押或别的任何方式从基督徒或基督教会取得财产。当基督徒通过转让、遗赠、出租或遗产信托的方式将财产交与他教信仰者管理时,上述财产则被收归附近的教会所有。(4) 剥夺犹太人与基督徒的通婚权。继君士坦求斯皇帝的规定之后,388 年狄奥多西皇帝做出了比他更为严格的规定,即,男犹太人不能同女基督徒结婚,男基督徒也不能同女犹太人结婚。如果这样结婚,则被视为犯有通奸罪。(5) 剥夺遗产继承能力和财产受赠权。罗马法上,遗产继承能力包涵两层意义,即积极的遗产继承能力和消极的遗产继承能力。所谓积极的遗产继承能力是指财产所有人以遗嘱的形式依法处分自己的财产的能力。所谓消极的遗产继承能力是指继承他人财产的能力。根据《优士丁尼法典》的规定,任何接受他教信仰者均不得获得不动产、继承他人遗产或接受遗嘱、遗产信托。这一规定同样也适用于军人^②。同时,他教信仰者和犹太人不得订立遗嘱和实施赠与,如果他们无遗嘱而亡,则由信仰正统基督教的亲属继承,否则,由国库继承。而且犹太教徒父母不得剥夺正统基督徒孩子的继承权,即使他们对父母犯有不敬行为。

3. 关于背教者的限制性规定。所谓背教者是指改信他教或参加他教宗教祭祀活动或进入他教庙宇的正统基督徒。基督徒皇帝将背教者尤其是改信犹太教认定是犯罪。为此,基督教皇帝规定,对一般的背教者而言,禁止接受遗赠和继承他人遗产,不得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即使死后被他人证实为背教者,则他于生前订立的遗嘱也当然无效。对那些背离基督教并用他教迷信亵渎基督教洗礼仪式者,剥夺他们的诉权、遗嘱能力和接受赠与的权利^③。对于那些通过胁迫诱使奴隶或生来自由人为了不名誉的他教或宗教仪式而离弃正统基督教者,则处以极刑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④。可见,基督徒皇帝对背教者的处罚较之于犹太人和他教信仰者甚为严厉。

4. 关于异端教派(Heresy)的限制性规定。在所有非正统基督徒中,持异端学说者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特别是摩尼教徒和多纳图教徒。在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看来,摩尼教徒和多纳图教徒的习惯和法律与其他人毫无共同之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狄奥多西皇帝是第一个宣布异端教徒应被判处极刑的基督徒皇帝。他的这一偏见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基督徒皇帝的立法选择。也许正因于此,优士丁尼时代,摩尼教徒和多纳图教徒的境遇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还有一丝恶化的迹象。这是因为,优士丁尼不仅继承了狄奥多西皇帝及其继任者关于惩罚摩尼教徒和多纳图教徒的法律,而且宣布他们是违反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公犯。

罗马基督徒皇帝对待异端教徒的这种敌视态度都鲜明地反映在《狄奥多西法典》和《优士丁尼法典》的规定中。在这两部法典中,异端教徒被认定是不名誉的。基督徒皇帝禁止他们公开或秘密集会^⑤,禁止与以前教会的教徒交往,禁止在教会担任教职,而且剥夺他们担任具有一定利益的公职的权利和因民事管理而取得的荣誉,而强制要求他们担任那些需要自己负担巨额费

①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 Macmillan & Co. Ltd., 1923: 26.

② C. 1, 9, 6,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③ C. 1, 7, 5,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④ C. 1, 5,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⑤ C. Th. 16, 5, C. 1, 5, 3,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用的职务^①。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以遗嘱处分他们的不动产或接受他人遗赠的不动产、不得实施赠与或接受他人赠与、不得缔结合同、禁止买卖。奴隶可以告发身为异端教徒的奴隶主；还可以通过加入正统基督教教会而获得自由。基督教皇帝还命令烧毁异端教徒的所有经书。异端教徒的子女被剥夺财产权和遗产继承能力，除非他们抛弃父母的异端邪说而信仰正统基督教。可见，异端教徒因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憎恶情结对罗马基督徒皇帝的影响而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被控诉或遭放逐已是习以为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被审问之前就已经被放逐了。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异端教徒还会被判处死刑。

5. 关于撒玛利亚人的限制性规定。与其他的他教信仰者相比，基督教皇帝对待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的态度似乎显得温和一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优士丁尼皇帝对待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的态度似乎扑朔迷离，阴晴难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颁布的《新律》中。根据《新律》第129条的规定，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可以享有遗嘱能力，在被继承人无遗嘱而亡的情况下，可通过法定继承权取得遗产。同时，享有赠与能力和接受赠与能力，还有缔结合同的能力。在无遗嘱继承中，婚生子女和法定范围内的宗亲属的继承顺序则要优先于因父亲承认或收养而形成的宗亲属^②。从该规定来看，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地位较之以前的待遇明显有所提高。然而，好景不长，《新律》第144条剥夺了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的上述权利。根据该条规定，撒玛利亚他教信仰者不能依遗嘱取得财产或依赠与合同取得财产。并且，无论是撒玛利亚人、异端教派教徒抑或那些假装信仰正统基督教者均不得享有无遗嘱继承权，也不能订立遗嘱、有效地实施赠与，除非遗产继承人或者受赠者是正统基督徒。倘若不是，他们的财产将全部收归国库所有。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独尊基督教和全民均负有接受洗礼义务的条件下，除了具备自由身份、市民身份、家族身份和名誉身份外，基督徒身份也是自然人取得和享有完整人格的必备要素。只有同时具备这5种身份，自然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从而取得完整的权利能力。

三、结 论

从多神教时代到基督教时代，罗马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从宽容到不宽容的二度循环。第一度循环是从前古典时期到古典时期。对外扩张战争打开了罗马大门的同时也打开了罗马人的心扉。他们海纳百川，接受各族宗教文化，与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和平共处。然而，基督教的传入，打破了不同宗教信仰者间的平静。早期基督教宗教仪式的神秘性、坚守一神论而拒绝承认皇帝崇拜和多神教、以及对罗马社会恶习的猛烈抨击，引起罗马他教信仰者对基督教的憎恶，甚至于无法容忍基督教在罗马的存在。于是，罗马的宗教政策就从宽容变为了不宽容。一场血腥的迫害基督徒的运动席卷而来。在这一场运动中，基督教身份的承载者都受到了放逐、被判处矿山服劳役、斗兽和死刑等人格变更的惩罚。可见，在不宽容的宗教政策下，宗教身份便成为了人格变更的原因。第二度循环是从基督教取得合法宗教地位之时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时。尽管君士坦丁皇帝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依然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主张各宗教团体间应和平共处。到狄奥多西皇帝执政时期，基督教成为了帝国国教。为了维护基督教一神论信仰和正统地位，狄奥多西皇帝和其后继的基督徒皇帝针对非基督徒和异端派教徒制定了严厉的惩罚规定，通过直接剥夺他们的部分乃至全部权利能力来限制他们的法律人格。由此可见，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使得宗教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完整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C. 1, 5, 1, (参见 Justinian. The Codex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② Nov. 129, (参见 Justinian. The Novels of Justinian [M]. Translated by Samuel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Dynamic Sunyata and Process Thought: A Case Study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in Religious Dialogue

Li Yijing

This article first expounds how Masao Abe interpret Buddhist idea of sunyata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 Christian Dialogue , pointing ou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his interpretation is taking Sunyata as a dynamic activity rather than a static state. Then it examines some scholar's views on Abe's interpretation , arguing that Dynamic Sunyata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Finally ,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Sunyata and process thought , it finds out that Abe's understanding of "Dynamic sunyata" is probably inspired by the religious dialogue , therefore Abe's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is also transformed in a fundamental way by Christian thought.

"The Worship of Yahweh" and the Ancient Israelite Society: Norman K. Gottwald and Marxist Biblical Criticism

Cheng Zuming

The Biblical Social – scientific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s of contemporary Biblical Criticism , which source is from modern scientific criticism , but systematically exerted sociological theory to the Biblical criticism and set up Biblical Social – scientific criticism , begins sixties in the last century. Norman K. Gottwald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Biblical sociological criticism. He successfully introduces Marxist sociological theory into Biblical Criticism , and reconstructed the ancient Israelite society around worship of Yahweh. Starting from "The Model of Revolt" , he discusses that the worship and faith of Yahweh takes place in the oppressed class of the rural farmers and herdsmen , whose social relations of equality had led to the birth of faith and worship of Yahweh. The faith and worship of Yahweh not only brings a set of "ethics" , but is the power symbol deeply into social structure , plays a unique function in Israel's social , economic and culture , and also is an indispensable force in maintaining equality of the Israelite commun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resisting external aggression.

The Religious Status and Roman Personae Law

Wang Qin

Religious status was what som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its believers were placed position in the mundane society. Before the Christianity was disseminated in the Roma , kinds of religious groups had gone along with each other. At the time it didn't affected the law status that one enjoyed some religious status. However , the situation took place as the Christianity expanded into the Roma. As the loathing of the Christian , some non – Christian began to persecute the Christia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Because of the Christian status , the Christian was expropriated of the roman citizen status or the libertas , which caused him to be reduced to the peregrinus or slave. Then the religious status became a kind of reason which led to capitis diminutio. But when the Christianity was established as the nation religious of the Roman Empire , the orthodox Christianity became a component of the whole personae. That is to say , as long as one believed orthodox Christianity , he might enjoyed the whole rights capacity; on the contrary , his some concrete right capacity might be limited , but it didn't result in the status being expropriated.